

除了外卖行业,还有哪个行业在规避支付员工社保

5月29日,美团王兴针对业界关心的美团骑手社保问题进行了回应。

王兴表示,美团将为所有外卖骑手购买员工工伤保险,按照王兴的说法,这是一套由平台、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合作推出的方案,与传统的工伤保险不同。该保险方案的制定还需要考虑到目前美团骑手所缴纳的商业保险,这其中的重合部分还需要再考量。王兴所提及的商业保险,指的是此前美团骑手每人每天3元的商业险,该费用需要从骑手佣金中扣除。

美团规避骑手社保的法律依据,在于骑手和平台或者劳务外包公司签订的并非劳动合同,而是产品代理合同,骑手和平台之间的关系,是产品代理关系,平台按照每个订单,支付骑手相应的佣金。

当然这不是孤例

保险行业按照相同的逻辑,公司和广大的保险销售人员也是签订代理合同。看下某省会城市PA保险营业部的代理人考勤制度,这些代理人依然要按时上班考勤打卡,迟到一次扣50元,迟到30分钟以上扣除当天绩效,缺勤一天扣除150元绩效,尽管这

些钱肯定不会以工资的名义扣除,保险公司和代理人之间的关系怎么看都像都是雇佣关系而不是代理关系。

同理是不是餐馆也可以和传菜的员工做菜的厨师配菜的员工签订代理合同呢?只能说,保险和外卖行业,资方依靠强大的议价能力,以看似较高的薪水为诱饵,诱使签订代理合同而不是劳动合同。

按照公开信息,中国第二大的保险公司PA集团拥有40万寿险代理大军,2020年中国PA总收入12000亿元,净利润1400亿,其中寿险利润为1000亿。如果按照社保支出每人每月2000元计算,40万人的社保每月将增加8亿元支出,每年100亿,该公司还是有能力承担这部分开支的。

外卖行业就不一样了,2020年美团营收1147.9亿,其中外卖收入662.7亿,占总营收的比例为57.7%。2020年全年净利润47.07亿元,如果2020年美团为所有专送骑手缴纳社保的话,大约需要回吐利润100亿元左右,远远大于去年全年美团净利润47.07亿,这也是王兴根本无法直接面对的。

无论对于百万保险销售大军,还是千万



外卖骑手,企业规避社保问题是不对的。这批上千万的群体最终会老去,体制不会任由这么大的人群老无所养,这些人的养老保障最后必将推给社会保障体系承担,那时无疑将摊薄现在照章缴纳社保的人群的未来收

益,这样对现阶段广大照章缴纳社保费用的个人和企业是不公平的,届时旧的不公又将引发新的不公。骑手和保险代理的养老方案,不应该永远处于放任状态。我们说,无论MT,还是PA,显然都不是好公司。

把课间十分钟还给活蹦乱跳的孩子

课间十分钟,同学们三三两两围成一团,有的踢毽子,有的跳绳,有的扔沙包,有的弹玻璃珠,直到上课铃响才气喘吁吁、依依不舍地回到教室……然而,中小学课间十分钟逐渐变得“静悄悄”,孩子们只有喝水、上厕所才被允许离开教室。6月1日,教育部发布了《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不得对学生课间出教室等设置不必要约束。(《新京报》6月15日)

曾经的下课活动时间,如今已变成了学习休息时间,除了喝水、上厕所等必要活动,一切活蹦乱跳的活动都不提倡,甚至成了禁止打闹的具体内容。

将于9月1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第八条规定学校不得设置侵犯学

生人身自由的管理措施,不得对学生在课间及其他非教学时间的正当交流、游戏、出教室活动等言行自由设置不必要的约束。这意味着,进一步明确了学生课间十分钟的活动权,并将其放在是否侵犯学生人身自由的高度上看待,目的是督促学校将课间十分钟恢复成本来的样子。

诚然,十分钟很短,可也正如白岩松之前在节目中所说:“连课间十分钟都很难走出教室的孩子,怎样支撑一个民族的健康呢?”课间十分钟正是学校教育理念的一个缩影,严格禁止孩子们自由活动的学校,想必也不可能重视体育课,因为构成其担心的内核其实是一个——怕出事,怕担责。顺着这一思路,体育课难以保证,不断剔除单杠、

跨栏、跳马等“高危”项目,也就能够理解了。

道理很简单,家长有“孩子不受伤”的要求,学校有“我们担不起”的顾虑,两方一拍即合,使得孩子们渐渐远离阳光和户外,失去了锻炼基本运动技能的机会。长此以往,“中学生运动会纪录‘沉睡’40年无人破、高中班里引体向上少有人达标”的新闻也就再正常不过,被课业负担压得喘不过气的孩子本就无暇锻炼,如今连校内运动也越来越“斯文”,他们的体质如何能不下滑?也许正是由于体质变差,才使得原本正常的体育活动变得危险起来,难道这一恶性循环还要被继续加固吗?

想要改变,不能仅靠提倡和引导,还需要对症下药,解除学校的安全顾虑。一方

面,围绕影响课间十分钟活动效率的原因入手。教师能否不拖堂、卫生间和户外活动场所是否达标等,都需要进行考核,让孩子们有时间活动,也能活动开。另一方面,学校是学生在校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必须依靠制度性的措施解除他们的顾虑。尤其是在家长敏感度更高、维权意识更强的背景下,大力推行校方责任险显得尤为必要。面对“意外比例低、赔偿金额高”的特点,保险制度正好可以大展身手,有效化解和转移学校的赔偿压力。运动就会有风险,但不运动的风险却更大,唯有从制度上减少学校的后顾之忧,课间十分钟和体育课才不会变成鸡肋,也才能从根本上让学校打消顾虑,切实让中小学生学习真正动起来。

(上接第28版)1800余亩绿色有机蔬菜种植基地,实现了农业的规模化运营。榕珍菌业一天生产50万吨以上的杏鲍菇,每年产值达到约2亿元,以3000元工资的投入为400多人提供就业岗位。妈妈农庄的薰衣草花田,每年吸引上百万人次的游客来到战旗村,村里的人气也旺了起来。

2020年,战旗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52万元,集体经济收入达653万元。村民基本医疗保险、社区物管均由村集体经济进行全额支付。每到春节、中秋、国庆,村子还会组织村民们聚餐吃“坝坝宴”,乡村的人情味也延续了下来。

回顾成都市近20年的农村与土地改革,姚树荣认为大致呈现出四大特点:

第一,重点从宅基地着手,实现了宅基地保障性、财产性、经营性的多功能利用与统筹兼顾;第二,坚持市场化的基本取向,在保障农户合法权益的前提下,自觉转变政府职能,从政府单一投资转向鼓励社会资本、农民集体投资;第三,完成了从城市偏向到乡村优先的转变、从转让发展权换取乡村建设资金,变为土地使用权入市、作价抵押等方式吸引资本下乡、促进三产融合;第四,制度的微更新、渐进演化为农民理性的培育、能力的提升准备了足够时间,实现了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以及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系统性转变。

城乡共生的路径没有标准答案。这些年,通过放活制度空间,成都的乡村振兴拥有了不同的可能。

斜源小镇地处大邑县山区,平均海拔900米左右,为茂密的森林所环抱,长期以来以煤矿作为主导产业。2008年,斜源遭到汶川地震的破坏。第二年,成都关闭所有煤矿,斜源的经济再受重创。于是,当地利用土地综合整治和灾后重建政策,筹集4.17亿元资金,新建了14万平方米的川西民居特色小镇。

山上的3000余居民集中搬进了小镇新居,城镇化率一下上升至83%,但急剧的变化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成都三加二公益阅读推广中心执行长邓淙源带领团队,负责操盘斜源小镇的乡村振兴。他回忆说,小镇建设初期,很多居民进城租房买房,将近三分之二下来的新房被空置。入住新镇的村民依旧堆柴生火,导致社区环境脏乱。一直到当地大力气完

善基础设施,处理好卫生问题,小镇的味道才基本出来了。

矿场关闭后,产业空心化也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此,斜源发展中药材、青梅、佛手瓜产业,从高耗能的发展模式中解脱出来。当地留存着药佛山窟、唐代白云庵遗址,有一定旅游资源。邓淙源的团队还将斜源小镇定位为“共享小镇”,作为游客前往西岭雪山旅游时的中途休憩点,通过“市民下乡”引入民宿、咖啡、手作等业态,发展旅居产业、区域旅游、共享经济。

每到暑假,城里人便携家带口赶来纳凉度假,斜源出圈成了网红小镇。2019年,斜源小镇的游客流量达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1亿元。当地的房屋私下交易售价从每平方米1800元增至5000多元,村民的资产也实现了增值。

同在在大邑县,安仁古镇走的是一条“文化赋能特色小镇”之路。

安仁是唯一的中国博物馆小镇。这里保留了27座民国公馆和36座现代博物馆。三条民国老街、国内最大的地主庄园,固定下民国时期的记忆和土改时期的历史痕迹。漫步于民国老街,既能见到当地人售卖本土小吃、竹编包等手工艺品,也能见到炮哥楼、戏台、咖啡馆,以及由民国中学改成的国际学校。

安仁政府选择与大国企华侨城集团合作,瞄准“文博、文旅、文创”产业,打造一个拥有100家博物馆的世界博物馆小镇,同时对接成都的文旅中心、对外交流中心功能定位,打造音乐小镇、西部国际会议中心。安仁古镇有关负责人牟俊辉说,很多年轻人不再外出打工,而是选择留在家乡做餐饮、开民宿,共享旅游业发展成果。

种种模式涌现,什么乡村振兴才是好的乡村振兴?

除了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在邓淙源看来,关键在于决策背后的核心理念,这将导向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如果单纯以项目为目的,就直接流转土地、流转集体资产,把农民全部都搬出去,引进市场资本投入打造,再进行招商运营。但是以乡村振兴为理念,一定是共创共享,一定不是把农民都迁出去,还要解决集体经济问题,解决市场资本下来后,如何和老村民共融的问题。”

实际上,这也道出了一些专家的担心:

资本下乡是否会挤压农民的生存空间?进城失败的农民无法再回乡务农,农村的蓄水功能是否会受到影响?无论如何,让乡下人过得更好是乡村振兴的初衷,政府、企业、村集体、村民、市民对乡村抱有各自美好的想象和期待,改革的关键是找准方向、协调好各方利益。

在这方面,入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社区试点的明月国际陶艺村或许是一个“让乡村还是乡村、让乡愁留在乡村”的典范。

明月村是成都最西边的村子,位于蒲江县甘溪镇。乘坐村民开的观光车向村庄深处驶去,视线一扫过清新的茶园、集中安置村民的小楼、漫墙绽放的月季,还有正在屋外坝子上剥笋的农人,伴着淅淅沥沥的细雨,别有一番风味。

2009年以前,明月村还是一个以种植粮食为主的市级贫困村,产业转换为雷竹、茶叶、猕猴桃、枇杷柑等经济作物后,才实现了摘帽脱贫。2011年,明月村为了修复被汶川地震损毁的古窑“明月窑”,引入一位陶艺专家驻村。随后,越来越多手工艺者来村里租用老房,发展文创产业。

明月村顺势而为,引进音乐、蜡染、篆刻、书法等领域的艺术家110多位,借助这些“新村民”的力量,在乡村景观营造上加入了艺术化设计元素,并开发出松林火锅、春笋宴等地道的乡村美食,通过开办体验式农场、举办雷竹春笋艺术节等活动,逐渐探索出农创加文创的发展模式,提升了农业的附加值。“在明月村,是一群有情怀的人在做一件有情怀的事情。”一位曾多次来到明月村的房地产行业人士介绍,县政府为明月村配套187亩国有建设用地,拒绝了房地产企业抛来的橄榄枝,破例将土地划分为17块,以“招拍挂+补贴+点状供给地”方式卖给艺术家,定向发展文化旅游艺术项目,控制住了村庄的产业方向。

而今,明月村的松林竹海间散落着44个文创项目,其中院落改造27个、陶艺手工艺文创园项目17个。1380多户老村民,一半住在老房里,一半则住进了集中安置的小区。村民创业区另将30多户老村民集中到一起,开民宿、办农家乐、办手工体验作坊。村里还有3000亩茶园,8000亩雷竹,农业仍然是主业。迄今150多名村民返回明月村创业,2020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7万元。

原有的乡土社会也延续了下来。村里不时举办诗歌音乐会、皮影戏、书画展,村民成立了舞蹈队、合唱团,还制作了一首清澈的村歌《明月甘溪》。2016年明月村引入垃圾分类后,村里的晨跑小队会在节假日领着村子里的小朋友一边晨跑、一边捡垃圾,通过积分兑换奖品的方式鼓励其参与。乡风也随之而改。

然而,明月村是罕见的、稀有的。

明月村的基础设施主要由政府投资打造,第一家餐馆、第一家民宿、第一个创客服务站等示范性项目均由政府补贴,国有建设用地由政府特意配套。一些专家认为,这种模式所需的财政投入高,难以在其他村庄大量复制。此外,在政府主导的模式下,如何处理专业团队与政府的意见分歧也是挑战。

复盘成都的乡村振兴案例,参与明月村建设的邓淙源总结,“三个不任性”很重要:权力不任性,在乡村建设的专业性问题上,不是“谁官大谁说了算”,而是充分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农民不任性,诸如明月村向手工艺者出租农民房子时,统一规定3000元、5000元、8000元的三档价格,由村集体统一签约流转,并以“修路不经过家门口”等软性方式约束农民坐地涨价的行为,才得以稳住引入村里的项目。更重要的是,资本不任性。邓淙源说,资本力量非常强大,但讲求的是经济逻辑,可能会与村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理念产生冲突。而实际上,资本下乡后能否确保农村的耕地继续种植粮食?农村土地是否会走向房地产化?中国的制度设计该如何平衡好空间与约束之间的关系?诸多问题仍然尚待理清。

过去20年,成都的土地制度改革探索仅是中国实现乡村振兴的初步尝试。我们看到,一些村镇的空间结构、产业形态发生了改头换面的变化,附着其上的乡土社会也和以往不同了。但未来,成都的城乡共生现象会如何演进?以2021年为坐标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之后,中国的农村将走向何方?现在仍然是未知数。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随着6月1日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施行,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与落实得到法律规范,确保乡村振兴在各地不松懈、不变调、不走样;伴随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深入,一个崭新的城乡中国将逐步浮出水面。